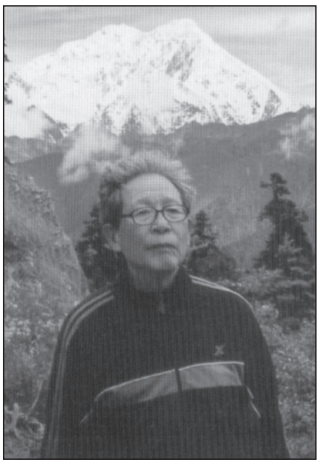
戴宜生：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徐 琤（1946—1948 社会）



戴宜生二〇〇八年八十岁进藏背景喜马拉雅南迦巴瓦

一、真诚的友情

戴宜生（戴宝）是我的清华同学，但在学校时互不相识。关于他的情况我是听老伴姚国安讲的，他是戴宜生的入党介绍人。说他的父亲是金城银行的副总裁，家里很有钱，他把父亲为他留学美国准备的钱和他母亲的私房钱都拿来作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1948年他跟姚一起受地下党派遣，离开学校，到南方做党的地下工作，戴去了重庆大学当助教并做学运工作，姚去了贵州。

戴到重庆时，正赶上地下党被破坏，一时接不上关系，很苦闷，和重华暗语书信联系，重华鼓励他坚持，后终于打开局面。但由于暴露，1949年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戴宝紧急随父亲去了香港。正巧姚国安、梁燕、黄培正几位清华校友也因在贵州做学运工作，国民党要逮捕他们，紧急撤到香港。当时，国内长江以北全部解放，南方局领导已去武汉，在香港接不上关系。于是四人化装成商人，由姚国安精心组织，戴宜生提供经费，历经艰难险阻，辗转到达已解放的汉口。姚国安找到时任中南局组织部长钱英，他们都接上了组织关系。姚国安留在钱英身边当秘书，戴宜生等三人参加一段学习班后随解放军南下，梁燕去贵州，黄培正去广州。戴宜生去重庆，做公安局外事工作。1951年他和新婚妻子李淑琼(北大毕业生)积极申请，参加了入藏先遣队，这时，他22岁。

戴与姚再见面是30年后的1981年。戴在西藏呆了28年，刚调回北京不久，打听到姚在上海复旦大学当党委副书记，身患癌症病危，就请假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这时，我初次见到戴，记得他激动地对姚说，他在西藏参加了第二次革命，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临别时，重华对他说："你回去工作吧，我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我不怕死，我担心的是徐琤，我死了她一个人孤独得很呢。"

戴宜生与我的关系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与姚的关系很深，姚走了，他就给了我真诚的关心。他不断给我寄各种书籍，中英文都有，有的是香港出版，内地买不到的。还寄奥斯卡经典影碟。我非常感激他，在给他的信中谈谈自己的读书心得。

他也寄我他写的文章。

我一般每年都去北京一次，参加清华老同学聚会。朱厚泽是姚在清华中学发展的党员，当时他在北京当中央宣传部部长。我到北京，总在他家住上四五天。戴由此认识了厚泽，他来看我，厚泽热情接待，与他谈天说地。戴认为厚泽是位高人，有幸与他交往，受益匪浅。厚泽不幸去世，他与我同样悲痛欲绝。

二、雪域长歌

戴的父亲是留美的，思想开明，给了他民主自由的教育，使他的性格诚恳、慷慨，又风趣幽默。他戏编《戴氏英语》，说英语相声，他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晚年出了一本书叫《戴宝自选集》，详述他的一生。因为他南开中学的那伙同学说他常耍活宝，有宝气，故自称“戴宝”。

1951年5月，戴宝夫妇从成都出发到甘孜，翻山越岭，一星期内完成了这一步行的旅程，随后编入十八军先遣支队。当时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刚签，为尽快稳定局势，先遣支队护送阿沛·阿旺晋美一行，选择最短也是最艰难的险途赶赴拉萨。几乎每天都要翻越4500米以上的雪山，还要渡过金沙江、澜沧江等急流。山上厚厚的积雪终年不化，往往快到山顶时，还会遇上突如其来的鹅毛大雪，身上霎时全白了。海拔如此之高的地方，气压很低，空气中含氧量一般只有内地的50%，被称为“生命的禁区”，基本上都是冰天雪地的无人区。

戴宜生回忆道:一次在进军途中，意外地碰见了清华“一二·九”时期的老校友林亮同志（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入藏后任西藏拉萨市委书记。1953年因病调回云南，曾任个旧市委书记、云南大学党委书记，1994年病逝）。“和林亮校友零距离接触，是发生在翻过6400公尺的丹达雪山后，跋涉于‘穷八站’的漫长崎岖的山沟中的事。我在行军中，老是一个人掉队。所以总是要大家安营扎寨、炊烟袅袅、千帐灯火时，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营地。这一天我正一个人艰苦独行，忽听后面马蹄声，原来林亮同志和他的警卫员策马奔来。见到我，林亮下马：‘听说你是清华的，这样的行军，你习惯吗？’‘没有问题，给我时间，我正努力克服困难，尽快实现这个脱胎换骨的转换。’”“我

1953 年初戴宜生一家在拉萨市公安局，藏族人为保姆

1952 年戴宜生与拉萨出生的女儿西维梅朵

们从1951年7月25日出发，9月初才到拉萨。我爱人淑琼在后队，走了5个月才到拉萨，而且她还身怀六甲。1952年我们有了一个女儿，我们给她起名‘西维梅朵’，汉文就是和平之花。但当时部队不许在当地征粮，全靠内地用牦牛驮来，粮食奇缺，女儿营养不足，一岁多还不会走路，只好把她送回四川由姥姥抚养。现在想起在西藏的经历，好像是昨天的事，那真是一种脱胎换骨的体验，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1951年，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此后中共西藏工委和噶夏政府两种不同的政权共存了八年，这段时间西藏的社会情况是很不平静的，常有匪徒出现。戴宜生在公安部门虽然主要负责外事工作，但也参加了惊心动魄的平叛斗争。审讯员王克洛就告诉戴宜生，有两名匪徒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个曾交待：他曾准备暗杀一个公安人员，他每周六要骑自行车到西藏干部学校的爱人处，他们埋伏在路旁的树木中伏击。不料来了一批西藏贵族的反动武装，双方有了误会，相互争吵，剑拔弩张之际，那个公安干部已骑车过去了。此人即是戴宝。

1957年，戴宜生调到西藏工委社会部政保处任副处长，和他一起进藏的侦察科科长李凯，就在和他一起抓捕叛匪时，倒在了他的身边。李凯和戴有深厚友谊，而且屡立战功。1958年4月24日在拉萨举行了隆重的李凯烈士追悼会，张经武、谭冠三等领导都参加了会。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反动上层公开全面叛乱，叛乱分子以“西藏僧俗人民”的名义，在拉萨街上到处贴布告。西藏工委副书记周仁山责成工委社会部揭取一张布告作为罪证。那时拉萨街头叛军岗哨林立。戴宜生和社会部张云卿、藏族干部练冬生乘一辆三轮摩托车冲到八角街反动布告张贴处，两边守卫的藏兵端着刺刀冲了过来。戴宜生平端冲锋枪与他们对峙，双方剑拔弩张。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社会部的王克洛和洛布多吉冲过来，洛布多吉手持一个拉出了弦环的手榴弹冲到藏兵前，怒吼道：“我今天跟你们拼了！” 藏军见状纷纷逃离，社会部成功揭取布告。洛布多吉是达赖二哥嘉乐顿珠庄园的奴隶，1956年从庄园逃出参加革命。这位农奴拯救了戴宝。

1959年西藏整风，戴宜生差点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幸当时西藏一把手张经武说：此人出身富豪而能背背包千辛万苦步行来藏，恐非反、坏、右之属，才没划反革命。但仍给留党察看、行政撤职处分。

文化大革命，戴宜生因位列公安厅副处长，划为“走资派”，被进藏造反的清华井岗山红卫兵和当地造反派押在卡车上游街，后来发配在炊事班养猪、种菜。他不但乐观地生活，还抓紧时间钻研英语、藏语。到了改革开放，公安部急需懂英语、藏语的干部，就想起了戴宜生，1978年底把他调北京公共安全研究所任所长，他正好发挥所长，引进、翻译了不少外国资料，参加了各种学术研讨会，并结合国情写了许多有关犯罪学等方面文章。1994年还被派往美国宾大讲学半年，结识不少美国这方面的专家教授，打开了新的天地。每逢圣诞节、元旦，他寄出的贺卡信件达100多件。这时他也总不忘给西藏有困难的战友寄东西寄钱。

戴宜生说：我热爱西藏。西藏民风彪

悍，地形险阻。对敌斗争中的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就产生在这里。我的战斗洗礼、传奇故事也出自这块地方。西藏教育了我，锻炼了我。西藏给我的比我给西藏的多得多。我热爱这片土地和那里的人民，永远怀念那里的战友。

2008年戴宜生80岁，他的腿关节已有毛病，不顾亲友的劝阻，再次进藏，重返故地。在小儿子和孙女陪同下坐火车进藏，用了半个多月遍访故地，受到了藏族干部的热烈欢迎，他们就是当年翻身的奴隶，他的老相识。当年在荒滩上耕植出来的苹果园，现在成了烈士陵园，谭冠三政委就埋于此。不远处是他当年警卫工作人员夫妻的坟墓，他亲自去墓地吊唁。在来回的途中，再次瞻仰了世界有名的喜玛拉雅山山脉。

三、仍有晚霞在天边

戴宜生小时候长得白白胖胖，小学老师叫他“糯米团”。后来老了，一身是病，拄拐而走，步履蹒跚。2014年底有一天他摔倒在家门口，躺在冰冷的地上起不来，过路人叫110送医院抢救。在医院吊了好几天针，回家后走路还是不稳，几次摔倒在地上。之前肺部有气泡，用长长的钢针，从外边穿入肺部，把肺泡刺破，气泡中流出液体，又用吸管吸出体外。至今仍有残余的积液，需每天吸氧一二小时。腿关节做了人工置换。肠胃不好，经常便秘。其实这些病与他在西藏时的许多不利因素有关，但他始终无怨无悔。他只有亲兄弟俩，他哥哥病逝，对他打击很大，很多老同学老朋友又一个个走了，故旧半零落。他听美国民歌《老黑奴》，似也听到老天在声声召唤他。他的爱妻李淑琼1973年就因病调回内地，文革后才和他在京团聚，但晚年患老年痴呆，近几年病情加重，有时沉睡几十小时，有时胡言乱语，大吵大闹。他对她十分体贴照顾，在心灵上难免是遗憾和苦恼。

但是他还是尽量努力学习，尽量找事干，充实自己的生活，以抑制以上所说的无奈和烦恼。

后来我在信上问他在读些什么书。他回答说:“最近在看美国友人寄来的*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还有小三（三儿子）从香港捎来的刊物，美国的《时代》《国家地理》杂志。床头放着唐诗、宋词、诗经，天天翻翻，还有《北京青年报》《参考消息》《南方周末》《南风》等，还看影视剧。可见他学习上吞吐量是很大的。他还每天练毛笔字。

我很支持他的学习，给他寄去文房四宝，以及清华同学、书法家张昕若的字帖。我二哥善书法，他写的顾贞观的《金缕曲》，我也复印了给他。他很喜欢，说“你哥哥的字写得真美，顾贞观的词也实在好，我常拿出来欣赏。”他喜欢苏东坡、辛弃疾的词。我把张大千画的苏东坡像（复制品）复印了放在卷筒里也寄了。

2014年9月底，我在北京贺文贞同学家住了几天。戴宜生离贺文贞家很近，请我们去附近酒家吃饭，饭后坐轮椅到贺文贞家，与我促膝谈心，一直谈了6小时。他病困交加，心里太苦了，从我的谈话中他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吧。

（本文参考《戴宝自选集》
作了修改补充　2015年1月21日）